

September 2012

Cultural Signification and Literary Signification: with a Tentative Solution to Hillis Miller's Paradox of Literary Identification Mode

Yang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Yang. 2012. "Cultural Signification and Literary Signification: with a Tentative Solution to Hillis Miller's Paradox of Literary Identification Mod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5): pp.125-13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5/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化的意指与文学的意指

——兼论希利斯·米勒文学认同方式悖论的一种解法

刘 阳

摘要:意指理论以其对索绪尔语言论思想的深入发展而确立起文化研究的一块理论基石。意指内含着解码的要求。文化的意指通过二级符号系统去掏空与填实一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而得以实现,呈现为一条营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学路径。但文学的言外之意也来自意指作用,同样必须在符号学意义上得到阐释。沿此以进,希利斯·米勒等学者提出的文化研究视野下天真阅读与解码阅读构成的文学认同方式悖论,便获得一种可能的解法:这两种阅读方式并不绝对相悖,因为文学对言外之意的意指无蔽地发生于天真阅读中。这为新世纪我国文艺学界审视文学的命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观察点。

关键词:意指 认同 神话学 符号学 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刘阳,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电子邮箱:liutaiyang2001@yahoo.com.cn 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社科项目“叙事逻辑研究”[编号:10YJC751057]阶段性成果。

Title: Cultural Signification and Literary Signification: with a Tentative Solution to Hillis Miller's Paradox of Literary Identification Mode

Abstract: Signification theory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as it is built on in-depth explorations of Saussure's language theory. Signification implies the requirement of decoding. Cultural signification is realized when the signified in first level symbolic system is hollowed out and filled in by the second level symbolic system, and it then exhibits as a mythological path to bourgeois ideology. Signification informs the implications of literary works and makes them intelligi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Along this line of delineation, we may find a possible solution to Hillis Miller's paradox of literary identification mode between innocent reading and decoding re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e two reading methods are not necessarily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as the signification of a literary work to its implications operates also unconcealedly in innocent reading. The paper claims the plausibility of its theoretical observation in examining the destin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sign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mythology semiotics cultural studies

Author: Liu Ya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mail: liutaiyang2001@yahoo.com.cn

一、文化的意指

“意指”(Signification)一词,如今越来越常见于各种关涉文化研究的论著中。作为对索绪尔“能指/所指”关系模式的创造性理论发展,罗兰·巴特对于意指理论的建树不可忽视。在《神话修辞术》等著作中,他上承索绪尔的语言论思想,中接结构主义视野,下启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路径,建构起一套风格独具的意指理论。其涵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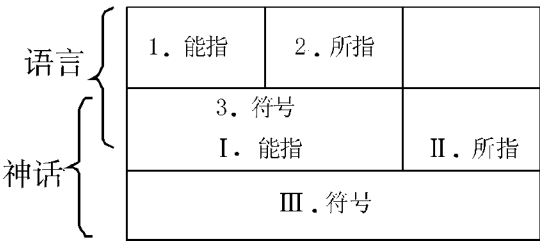
广,影响之深,都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接着它讲、讲出时代新意的理由。

意指理论直接受到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启示。按索绪尔,符号包括能指与所指,前者为音响-形象,后者则为概念、意义,两者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作为一种典型的符号,当然也符合这一基本特征。例如,以汉语读音“shui”(读第三声)为能指,以词义“氢氧化合物”为所指,两者合起来就构成了语言符号“水”。事实上,一个中国人也完全可以把这个语言符号读为“hua”(读第一声),这样发音根本不会影响水这种实物的存在。但当我

们长期以来始终将它读为“shui”(读第三声)时,此读音与彼意义的关系便被牢牢地绑定,变得约定俗成了,非如此读不足以进行正常的人际交流。索绪尔的语言学发现,改变了哲学关注点和地平线,把认为语言是透镜的传统理解,提升为关于语言本身的研究,相应地,把研究旨趣引向语言符号结构内部的构成机制及运作特征,在结构主义立场上深刻推进着现代思想的语言论转向。

罗兰·巴特的意指理论,建立在上述语言学发现的基础上。在他看来,索绪尔揭示出的语言符号内部成分,只是处于表层上的一级符号系统。他试图在此前提下进行的理论拓展,是把语言符号进而提升为神话符号,即创造性地促成一级符号系统向更高、更深层面的二级符号系统跃迁,以尽其潜能。发生于这个跃迁过程中的意指作用,被巴特视为揭露现代神话机制的必由之途。

意指的形成过程是:语言能指与语言所指构成语言符号,成为一级符号系统;一级符号系统中的语言能指被保留下,成为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新能指;同时,一级符号系统中的语言所指在某种程度上失效,被夸大成为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新所指;新能指再与新所指共同构成二级符号系统中的符号,此时,该符号已不再是语言符号,而变作神话符号。可图示如下:



不难看出,意指的关键在于一级符号系统中的旧所指成为了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新所指。巴特解释道,这源于前一所指发生了两步前后相关联的变化:部分抽空与夸大畸变。它先被神话操纵者暗中不动声色地部分抽空着原先的意义;再经过微妙的夸大,发生畸形的变化,成为后一所指,进而产生出具有新意义的神话符号。

仍以“水”这个语言符号为例。如果淡化该词作为“一种氢氧化物”的化学分类意义(淡化当然不等于完全取消),而部分保留下它的流动性、光滑性与柔韧性等偏重感性质素的意义,此时,作为一级符号的“水”的某个部分的意义被抽空,另个部分的意义则被保留。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这部分意义有利于迎合与实现神话制造者的企图,被视为特别有进行凸显与强化的利用价值。在这第一步工作的基础上,神话制造者继而进入第二步工作。他对水的上述感性质素进行蓄意的夸张,刻意的夸大,那被部分保留下的流动、光滑、柔韧性能,被和人的皮肤质量挂上钩,被说成是人体皮肤的保护神,并且在这样一种不知不觉的勾连中,流动、光滑而柔韧的水的护肤功能被抬到极致,水的意义被上升到滋养生命、与人的青

春须臾不可分离的自体高度。此时,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新所指应运而生。它与原先能指共同溶解而成了一个新符号“水”,这个新符号意味着“能让你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忘情水”。它是个神话符号。因为它渗入了夸大其辞的流行色彩,试图通过一种经过蓄意加工、改造的事实去成功俘获观众的心,和“夸父逐日”之类远古神话在说谎的实质上一致。我们会发现,这个神话符号的载体,果然就是一则主要面向都市女性的高级护肤液广告,从中运作出的是广告商对女性爱美、害怕青春流逝的心态的敏锐把捉姿态,和由此不遗余力去征服这一潜在消费群体、最大限度实现商品利润的鲜明商业意图。

意指,就存在于一级符号系统向二级符号系统的这种过渡中。这种过渡不断地、动态地、开放地创造着新的意义,所以罗兰·巴特主张“把意指理解为产生意义的过程,而不是这种意义本身”(巴特,“文艺”314),这里显然已隐含着稍后被文化研究视为重要方法依据的建构主义思路。确实,巴特关于意指作用的揭示,是在比索绪尔更为宏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展开的,首先意在有力地从事理论上揭露资产阶级种种意识形态。《神话修辞术》一书作为作者发表于1950年代法国《新文艺》杂志上的文章的结集,剖析了语言、服饰、手势、摔跤、拳击、新闻、广告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主题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符号,触及着它们无形中操纵现代人生活的真相。这种理论分析成功地告诉我们,神话不只存在于远古,也以另一种隐晦难测的形态出入于当今生活各个领域,“今日神话”未必显性地以超自然载体和幻想性对象为特征,但在有意将一种经过篡改的事实灌输给人们这点上,和远古神话可谓同气相求。唯其如此,以解析文化(文化即生活方式)的深层运作奥秘为己任的当代文化研究,便顺理成章地以意指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基石。诚如西方学界所公认的那样,《神话修辞术》一书“阐述了建立在文化研究方法上的解码活动的一些重要方面”(鲍尔德温等54)。编码/解码理论的提出者、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中肯地总结道,文化控制着整个意指过程,文化表征的实现途径之一便是基于索绪尔、经过罗兰·巴特创造性发扬的意指方向(霍尔7)。丰富的文化实践,正不断确证着意指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根本性。

从上述分析可见,以知识社会学视角观照,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意指理论的诉求是特定的,即揭露形形色色文化现象背后那个作为支配性潜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批判性意图很鲜明的诉求背景。然而,意指理论的学理理路本身却张开着客观的阐释空间,非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文化景观可以被纳入意指视野,意指的活力还越出了特定时空,在批判性的神话学诉求之外,能实现符号学意义上的中性理论指向,积极扩展出新的阐释前景。

二、文学的意指

深入地考察,意指理论有普适性的、值得引起文学理论研究重视的符号学功能。《神话修辞术》一书的问世,正被认为意味着罗兰·巴特从神话学家向符号学家的身份过渡(路易-让·卡尔韦 126)。这其中的理路仍始于对“今日神话”的界定。

罗兰·巴特把神话界说为一种“劫掠的语言”,劫掠在这里意味着对象意义的变形,也就是意指。等待着他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现实中语言之被劫掠,是必然的吗?这个基本问题关乎他的理论的效能:意指,是一种现代生活的必然逻辑吗?经过一番深入的论证,他得出了基本结论:“任何事物都躲避不开神话的侵袭,神话可从任何意义(我们看到还有从意义本身的缺失)那里展开其次生的模式。”这个论证过程使用了排除法,分两步排除对此可能产生的质疑。第一步是论证零度写作与意指的关系:零度写作能否抗拒被神话化的命运、从而避免落入意指呢?

按巴特,“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它是一种以沉默来存在的方式”(“写作”48—49)。针对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本体论及其文学“介入”道德的观点,它从相反方向提出中性、白色、零度的写作策略,试图以此回避社会价值判断的渗入,更好地维护文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从这种理论设想来看,应承认巴特有关“只有零度才能抵抗神话”的判断并不错。问题在于,零度写作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预设,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实现从不是想当然的事。无论是以曼海姆、舍勒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还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反思社会学,都证明着任何一种知识话语的建构始终离不开特定知识诉求与场域背景,对这个客观事实的认可,不轻易以包括零度写作倡导者在内的人的诉求意志为转移。在此意义上,与其说巴特为意指理论留下了零度写作这个漏网的空子,不如说他以零度写作的理想性反过来强调着形形色色非零度写作中神话现象的普泛与意指实质的一贯。于是,第一步质疑得以排除。摆在巴特面前的第二步质疑、也是文学理论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诗歌语言能否也抗拒被神话化的命运、从而避免落入意指呢?

从表面看,答案似乎可以是肯定的。因为诗歌语言一向给人的印象是充分、自由的含混多义。二十世纪以来一系列文学理论对此作出了扎实论证。如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原则,穆卡洛夫斯基提出诗歌语言“有意触犯”标准语言这一特征,都旨在廓清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性质差异。保罗·利科认为诗歌语言以其一词多义现象而有效克制着科学语言中一词对应于一义的局限,在对歧义的允诺中生出反抗科学主义迷信的力量,瑞

恰兹区分了语言的科学用法与感情用法,则都旨在廓清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性质差异。不难注意到,这些理论观点的举证确实更多地来自诗歌(韵文)。就是说,诗歌语言具有打破形而上学(如科学主义)试图加在它头上的神话的潜能。这是否相应地意味着,诗歌语言具有反意指能力?

罗兰·巴特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考察。尽管他一度认为确实有必要面对“诗占据了与神话相反的位置”这种一般人常会有的疑虑,但很快指出这样的疑虑不足以动摇意指理论的普适性:“正是诗所作出的抗拒本身,使其再度成为神话的理想捕掠物:诗歌面貌的根本秩序就是符号的明显无序,恰是这点被神话捕获,并被转换成空洞的能指,这一空洞的能指用以指谓诗意。”结果是,“诗顽强地抗拒神话,凭借此举,它反而束手缚脚地听凭神话的支配”(巴特,“神话”194—95)。巴特据此认定,诗歌中诗意的产生同样不离不弃于意指作用,仍属于意指过程所造就的带有神话性的现象。由于诗歌的诗意主要来自诗歌的言外之意,这是诗之为诗的根本,意指理论的分析方法,由此被认为可同样运用于诗歌言外之意的分析过程中。这里以陶渊明富于典型诗意特征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例,来检验意指理论对诗歌言外之意的阐释效能。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十个汉字的音节,构成这句诗的能指。“一位劳作者在东篱下采摘菊花并悠闲地打量着南山”这个意思,构成这句诗的所指。它们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级符号系统中的诗歌语言符号。但这还只是该句诗的言内意、表层意。对诗歌而言,其显现的生存本体主要体现于言外意、深层意中。当我们试图领略这句诗的言外之意时,意指便开始作用于我们的思路:我们把一级符号系统中的那个所指部分抽空与夸大变形,从而把一级符号系统中那个能指当作储藏另一层新的意义的容器,此时,这句诗的新意义是“人与世界相融合的一种生存境界”,这个新意义正是这句诗的言外之意,也是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新所指。从动态机制看,这其中的意指过程,先后经历了“掏空”与“充实”两个前后衔接的必备步骤,分别带来了“空洞”与“充实”的结果。让我们依次来分析。

首先是“掏空”。掏空原先一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因为,既然一级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在二级符号系统中仅成为了能指,这意味着当面对二级符号系统时,一级符号系统中原先的那个所指失效了,被二级符号系统掏空了。以上面这句诗为例。掏空环节体现为,把“一位劳作者在东篱下采摘菊花并悠闲地打量着南山”这个原意掏出并使之变空,为接下来把新的意思放进去做好准备。每个人在阅读陶潜这样的诗句时,都会带有一种不满足于表面意思、希望被更深层的意思所接纳的期待视野,期待的后果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十个字的本意被掏

空,只余下十个空空荡荡的汉字音节,它们失去了意义的承载,变成了巴特所说的“空洞的能指”,像一个有待于被放进东西而填补、充实、完善的空容器。

这就进入了“填实”。填实新的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因为,无论一级符号系统还是二级符号系统,最终成果都是符号,都必然同时包含着能指与所指这两个基本成分。为顺利完成二级符号系统,势必同时产生二级符号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仍由一级符号系统提供,而其所指却必然需要被新创出来。这个新创的过程,便是填实二级符号系统的过程,也是意指成功实现的关键。上面这个诗句里,在原意“一位劳作者在东篱下采摘菊花并悠闲地打量着南山”被掏空之际,“人与世界相融合的一种生存境界”这个新意思被积极填实进去,充实而成了诗句的新所指。至此,整句诗的言外之意便呼之欲出,它实现了自己作为诗歌语言的积极意指作用,带给我们阅读时不尽的诗意享受。

从上述分析可知,文学意指的关键,维系于一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与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前一个所指与后一个所指之间必须构成罗兰·巴特所说的“模棱两可”关系,才可能产生出积极意指效果。所谓模棱两可,是指两个所指之间既有基本的联系,更有后者对前者的创造性脱离。一方面,掏空是相对的,意指的发生不能完全脱离原意,后一指必须顾及前一指的基本意义,彻底重起炉灶的意指是缺乏合法性的、无效的。另一方面,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的,则是后一指对前一指作出的创造性变形。

仍在上例中,“一位劳作者在东篱下采摘菊花并悠闲地打量着南山”与“人与世界相融合的一种生存境界”这两个意思,首先是具备着密切关联的。“东篱”、“菊花”与“南山”,都让我们自然地想到了自己所栖居的生存世界,它们之间产生联想关系的纽带是不突兀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菊花”这样的意象和“香草”、“美人”一样,带有千百年积淀其间的文化传统意味,已构成一个象征性语码(如“人淡如菊”),能很自然地引导读者由物及人产生有关淡泊性情的联想。与此同时,从这句诗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人在挣脱主体性宰制欲望束缚后对家园、对世界的一种回归与看护的姿态。这是两个所指之间相联系、相承继的一面。我们不可能在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句诗中读出现在这种意味,因为后者中那个一心去征服与开发世界的主人公形象无法带来人生在世的稳靠感。在此基础上,陶渊明又不失时机地巧妙拉开着这两个所指之间的距离,毕竟,“东篱”、“菊花”与“南山”,又不能和人的生存世界完全划上等号。这几个意象与人生在世的哲理意味之间,只是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却并不在具体的亲缘指向上形而上学化地定于一尊,两者之间被充分张开的距离,既因人而异,也恰是品尝这句诗的言外之意的焦点所在。

这里不仅需要创造性,而且需要以新的创造性视野不断去积极吸收和改造旧的创造性视野,最大限度地焕发出意义的魅力。如果以浪漫主义的视野看,这句诗在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新所指是“一位劳作者辛苦劳动一天之余,作为休憩,在东篱下采摘菊花并悠闲地打量着南山”,若如此,则南山在这种解读中仍只充当着供主体采用(因为休憩仍是为满足主体利益)的对象角色,只作为自然而现身,自然却不等同于世界,而是本质上仍与人类相对立的对象性概念,因而人与世界的鸿沟仍未得到真正消弭,人在世界面前的取向是心理的、生命的,不是本体的、生存的。但当以超越浪漫主义主体性形而上学局限后的现代存在论视野看,“南山”被虚化成了人生在世的表征,从一开始这个被虚化的本真世界就把人的有限位置吸纳于其中,这句诗在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新所指,才真正体现为一种超越了二元论的诗性自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优美”——这是他对康德“美的分析”中非功利、静观的纯粹鉴赏判断的理解——为学理背景,举这句诗为“无我之境”的例证,在二元论学理依据上道出了这句诗在他眼中的精要所在。我们还可结合与西方存在论更具深契之处的中国“天人合一”思想背景,进而谈论这句诗超越二元论的精要所系。就这样,诗歌在不同层次上的言外之意通过意指作用生发出来,成全着自己的深度与自由生存本体。从中我们得到的信念是,意指理论也对诗歌研究具有阐释效能。

诗歌属于韵文,与之对立的大文类是散文。散文能否同样从意指理论中得到深入阐释?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观点,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肯定性回答(纳博科夫1)。这一被国内作家王安忆等发展为“心灵世界”的思想,指小说创造着一个来自作家心灵的世界,它看似主观,却具有另一种不同于现实物质世界客观性的艺术客观性。从哲学上深追,这个被古今中外优秀小说实践证实的“神话”世界,对应于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即相对于客观物质世界1、主观心理世界2的、代表人类心灵客观产物的第三个世界)思想(波普尔7—8)。小说作为叙事的言外之意,就来自那个高于且照示着世界2的、独立稳然运作出的世界3,那里显现出创作主体在变动的现实处境中每每未能完全企及的、恒定客观的人类价值与意义,它们是高于作家主观的情感和使用的语言的。所谓言外,在这里正意味着世界1与世界2之外。世界3对前两个世界的超越,也就正见证着二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对一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的掏空与填实。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文论操作思路来自雅各布逊。他用横组合水平轴上的毗连性原则展开故事情节,又用纵聚合垂直轴上的相似性原则来揭示故事情节中的意义(如人格原型、道德启示等),认为避免失语症的关键在于保持双轴同步运作,理解叙事作品既需要在横向轴上弄懂故事的展开,也需把故事线

索从情节性横轴投射到代表故事意义的纵向轴上,这在操作层面上回应着三个世界的学说,叙事作为神话的魅力就植根于双轴的创造性互动及由此积极营造出的世界³。因此,散文文类中言外之意的生成与韵文文类一样,也合乎意指的实质,对之的阐述,是意指理论在符号学意义上同样乐于并且善于为之的。意指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根本性,遂得以证明。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罗兰·巴特之后,对意指理论,文化研究却比文学研究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学界一致认为集中讨论意指理论的《神话修辞术》一书是“专门讨论文化去神秘化问题”的基本著作(斯特罗克 57)。如果说在文化研究意义上,人们通过意指制造出的“今日神话”带有蓄意的欺骗性,往往经揭穿后并不为读者和观众所喜,相反容易引起不真实、受骗上当的反感(商业广告是最好的例子),那么在文学研究意义上,无论韵文抑或散文,人们通过意指制造出的意在言外的神话,却是作家和读者都乐于面对、感到真实并充满积极信念的。较之理论提出的原初语境——文化,意指理论提供给文学的扩展空间,受重视却不够,现在是加强这一翼研究的时候了。被视为文化研究基石的意指理论,原来同样可以澄清文学言外之意的构成奥秘,成为文学研究的有效理论资源。意指理论的这种两栖功能,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呢?

三、文学认同方式悖论的一种解法

以上论证表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各自的根本性质,都可以得到意指理论的阐释,被这同一种理论所兼容。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韦勒克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即“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韦勒克 8),另外两个组成部分是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则主要依托于乔纳森·卡勒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即以跨学科为特征的、“不是关于文学的”、而是“纯粹的‘理论’”研究,由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便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不可通约的研究范式。按托马斯·库恩,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是一种世界观发生“重建”的质变,它带来视野、方法与目标的根本转变(库恩 78)。这正是文化研究倡导者们对文艺学科边界、危机与合法性产生焦虑的原因所在。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学界往往同意,面对文学,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体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同方式,即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所概括的“天真的方式”与“去神秘化的方式”。前者又称为修辞阅读、快板阅读,即传统文学研究视野中人们对文学的认同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们以纯鉴赏的姿态投身于文学阅读中,充分享受文学作品的美感,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作品文本的权力符码中。后者又称怀疑阅读、缓板阅读,乃文化研究视野中人们对

文学的认同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们主动、自觉地去拆解隐藏于作品文本中的权力符码,文学阅读成了一种解码游戏,但也因此失去了传统那种阅读文学时所能享受到的美感。由于两种范式之间的突变关系,两种相应的认同方式也“不安地共存着”,米勒由此描绘出一种不乏忧患意识的悖论前景:“天真的方式与去神秘化的方式是彼此相悖的,一个会让另一个失灵,因此就产生了阅读的非逻辑”(180)。这种代表性观点透露出的共识是,由于分属不同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只能以悖论的形式共存,不存在一种同时去兼容两者、能在学理上既解释得了文化研究根本性、又解释得通文学研究根本性的理论。

但前面的分析显示,文化与文学得到意指理论阐释的机遇是一样的,两者的研究都能从意指理论中受惠。那么,希利斯·米勒上述悖论观将如何应对意指理论呢?前者可能被后者解开吗?我们很自然地面对着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在一般文学阅读活动(而非学者专家对文学的专门研究活动)中,对文学言外之意(而非本事索隐之类)的正常领会,属于“去神秘化的阅读”还是“天真的阅读”?若答案是前者,则意指便发生于人们对文学的解码阅读中,意指便阻隔着传统那种文学阅读美感的生成,意指也便与传统文学研究视野无关,而只与文化研究视野有关,由此文化研究可被认为因改变了文学认同方式、而对立于传统文学研究;若答案是后者,则意指便发生于人们对文学的天真阅读中,意指便伴随着传统那种文学阅读美感的生成,意指也便与传统文学研究视野同样有关,而不只与文化研究视野有关,由此也便不能简单断言传统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绝对对立,而应承认这两种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意指理论获得了一定的兼容视野与联结空间。答案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不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分析。

先从理论层面看。应该承认,当沉浸于文学带给自己的阅读美感时,我们的陶醉很大程度上正来自文学的言外之意。言外之意即诗意,它作为艺术本体的基本组建环节,在文学活动中是如海德格尔所说“一跃而出”的可能性。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氏认为诗的真理同时包含着“赠予”、“建基”与“开端”这三重含义。“赠予”是对寻常现存物的冲倒和可能性世界的直接敞开;“建基”防止前者“进入虚空和不确定的东西中”以至于成为“任意僭越的要求”,而“在铺设基础的建基意义上”创建真理,开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开端”则是诗中一切后来内容的可能性已“一跃而出”,成为了“直接性的跳跃的奇特性”。由此可知,“开端”确证着艺术本体的存在论层次,它已包含着“未曾展开的全部丰富性”,从而使其中“每一次转换都发生了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海德格尔 64),只有在无蔽状态下,真理才一跃而出,“只有起跑对头的人才能跃”。这意味着真理在艺术中是一种无蔽的

存在,艺术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正如当说此在的生存是一种可能性展开时,不是说可由此在的现实性部分去把握此在的可能性部分,就像通过亏缺的月亮去把握盈满的月亮那样,因为这已预设下一个先行存在的固定整体,故而所持的潜在立场仍是现成式的,这两部分已因我们的现成把握方式而截然割裂开来了,与之不同,对此在的存在来说,此在始终已是可能性本身,那个“尚未”,是作为此在之本已存在的组建因素现身的。对艺术而言,诗意即真理。这深刻表明,文学中的言外之意,并非以外于人的意志的、隐性符码化的、必然要求人解蔽的方式加给人,而是无蔽地、自然地生成于文学活动的创作与接受环节中,这一领会行为因而属于天真阅读,而非解码阅读。

再从实践层面看。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审美活动都证实着上述理论分析。对韵文而言,尽管“一篇《锦瑟》解人难”,但正如著名学者叶嘉莹指出的那样,“这些被组成的意象虽不可以确解,然而却可以确感,所以义山诗虽然难解,但却完全无害于读者对它们的欣赏喜爱”(叶嘉莹104),道理正在于其迷离惆怅的言外之意可以穿越任何知识背景的樊篱,而直抵不同阶层读者的心灵。今人张中行、王蒙等学者主张索性用“不求甚解”法来保护这首字面含混的诗作的完整意境(张中行29),显然便着眼于该诗在认同方面引发的“天真的方式”。对散文来讲,其言外之意是经由叙事语言组织的想象与虚构产生的意义魅力。罗兰·巴特举例道,像“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四只听筒中的一只”这个叙事句子中,“四”这个数词除交代情节外,还隐喻着先进的官僚技术。正是有鉴于叙事的这种言外之意,他同样谈论着具有永恒魅力的叙事性“文学这个神话”(“叙事”495)。这里进行着的天真阅读,也积极意指着言外之意。可见,一般人对文学言外之意的领会,既带有一定的解码性,也无蔽地发生于天真阅读中。如此,意指就并存于天真阅读与解码阅读中。意指理论也就不失为解开希利斯·米勒文学认同方式悖论的一种方案。

其实,造成米勒等学者视两种认同方式为悖论的原因,源于他们对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某种为我所用的夸大。斯图亚特·霍尔的概括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文化表征呈现出两种建构主义思路:一是上述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诗学)方向,致力于研究语言与意指的运作如何生产出各种意义;另一则是基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话语(政治学)方向,致力于研究话语实践生产出知识的方法。霍尔认定这两种建构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带有非历史化倾向,后者则具备特殊的历史语境。但是,按巴特本人所述,其意指理论貌似驻足于形式批评,实则也“适用于历史批评”,不能简单断言其缺乏历史性,巴特这一理论也能顺利阐释文学活动的言外之意,这本身便因文学活动的历史性而富于历史性。相应地,将其意指理论完全定位为文化研究的发轫性理论,也不尽妥善。巴特区分了

“以再现现实为条件”的批评与“以意指、指谓现实为鹄的”的批评,前者涉及意识形态,如对布莱希特戏剧中马克思主义主题的探讨,后者涉及符号学,如追究布莱希特戏剧中音乐、色彩、演员等形式因素。换言之,意指首先是立足内在形式、具备符号学中性功能。因此意指理论同时包含着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恰适性,而非对文化研究一边倒。这让我们想到,乔纳森·卡勒虽承认文学研究是“鉴赏性的”,文化研究是“表征分析的”,却表示“两种方法对于两种文化对象也都是适用的”(57)。这一观感更为客观。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意指理论既适用于文化研究,能有效揭开运作于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符码,也适用于文学研究,能有效剖析文学言外之意的形成机制。这为新世纪我国文论界继续思考文化研究进程中文学的境遇、深入探究图像时代中文学的命运,提供了一种辩证兼容的积极思想视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 [Baldwin, Elaine, et al.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Trans. Tao Dongfeng, et al.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 罗兰·巴特:《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Barthes, Roland. *Essais Critiques*. Trans. Huai Yu.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 *Writing Degree Zero*.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 *Mythologies*. Trans. Tu Youxia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Trans. Zhang Yuhe. *Selection of Masterpiece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Vol. 2. Eds. Wu Lifu and Hu Jingzh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车瑾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Calvet, Louis - Jean. *Structure and Symbol: Roland Barthes Biography*. Trans. Che Jinsh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rans. Li P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8.]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Hall, Stuart. *Representation*. Trans. Xu Liang and Lu Xin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Heidegger, Martin. *Off the Beaten Track*.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rans. Jin Wulun and Hu Xinh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Miller, Hillis. *On Literature*. Trans. Qin Liya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3.]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Nabokov, Vladimir. *Lectures on Literature*. Trans. Shen

Huihu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

[Popper, Karl Raimund. *Emancipation through Knowledge*. Trans. Fan Jingzhong and Li Benzhen.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1996.]

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渠东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Sturrock, John.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Trans. Qu Dong.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Wellek, René. *Concepts Of Criticism*. Trans. Ding Hong, et al.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Ye, Jiaying. *Jialing's Essays on Poetry*.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7.]

张中行:《诗词读写丛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Zhang, Zhongxing. *Essays about How to Read and Write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责任编辑:王 峰)

《现代中文学刊》2012 年第 5 期要目

访 谈

“新中国六十年的经验,要敞开让人讨论才行” 丁学良 张春田

专辑:纪念郭沫若诞辰 120 周年

“遗香犹自透蘼埃” 蔡 震

——郭沫若纪念河上肇的若干佚诗文

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 王 璞

——“顿挫”中的革命与修辞

郭沫若之“泪”与新文学的想象力 戚立强

郭沫若与《西厢记》 王锦厚

论郭沫若两篇历史小说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杨华丽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郭沫若早期小说研究 杨玉英

——《中国文学的三幅素描:郭沫若》

《郭沫若年谱》订补 龚明德

批 评

《天演论》与《民约论》 赵稀方

史 料

《淡水河殉情》解说 黄英哲